

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

王紹光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從文革開始那年算起，到現在29年過去了，但關於文革的研究，在中國恐怕還只是剛剛起步。

文革是十年（1966-1976），法國革命也是十年（1789-1799），但研究法國革命的著作可說是汗牛充棟，在西方至今仍然是一門顯學。我在耶魯大學圖書館查了一下有關法國革命的文獻，光已輸入電腦的書名就2,800種；近十年來發表的相關論文也有近800份之多。相比對這兩個十年的研究，不禁令人感慨萬分。當然，中國的文革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也許沒有法國革命那麼深遠，但就對本國後繼歷史的影響而言，兩者的意義恐怕差不多。正如法國大革命是法國政治中永恆的話題一樣，中國的文革也將成為中國政治中永恆的話題。1989年那場風浪中，政府與學生都重提「文革」舊事，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不對文革進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要不了多久，文革就會變成飄忽的神話、傳說。後世人如何繼承這份遺產呢？

一 文革研究的兩個限制

官方的限制是目前文革研究難以展開的一個重要原因。限制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文革定了性，不允許唱反調；二是對有關文革的

出版物有嚴格的規定。為文革定性的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革被說成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80年代初，曾進行過一次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決議這樣定性，有利於消除文革派性在現實生活中的持續影響，有利於政治上的安定團結，但不利於文革研究。研究者如果只能在既定的框框內，按既定的調調說話，又能說得出多少新鮮東西？

80年代中期我在武漢進行文革研究時，接觸過幾個秘密的團體。他們那時正各自在寫本地區的文革史。這些團體代表的是武漢地區文革中的幾大派。不管是當年的保守派，還是當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關於「兩派都是錯誤的」的說法。前保守派認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文革中的激進作法，何錯之有？前造反派強調，他們衝擊的是官僚主義和文革前的極左政策（如劃成分等），也不認錯。不管他們的動機如何，如果允許各種參與者從自己的角度分析文革，一定會對後來的研究者提供寶貴的資料。

除了定框框、定調調以外，官方還嚴格控制出版有關文革的書籍。1988年曾有那麼一個文件，專門規定出版此類書的報批手續。在此之前，還有文件規定調閱圖書館藏文革小報的審批手續，使專案工作人員以外的人很難接觸這些寶貴的一手資料。國內各地區圖書館藏的各類文革小報真可稱得上是「金礦」。海外收藏者難望其項背。海外收集的文革小報主要來源地是北京和廣州。至於其他地方的的小報只是零星有那麼一點。這也可以理解，在文革那些年裏，海外收集文革小報大概也只有靠北京的外交官和回廣東探親的香港客。由於文字資料的「金礦」仍封閉着不對研究者開放，且有關文革的研究成果很難找到出版渠道，如今能在市面上見得到的有關文革的書籍不多，已有的出版物無非是幾大類，一是文革時期中央領導人物的故事（如王、張、姚、姚、康生、林彪等）；二是主要事件的描述（如安亭事件、上柴事件、武漢七二〇事件）；三是各類人的遭遇（主要是政治、學

術、文化精英們的遭遇）。這些書的作者不少是下了功夫挖掘原始資料的，但更多的是東拼西湊，了無新意。稍微熟悉一點文革史料的人，都會對這些書感到十分失望。至於嚴肅的、學術性的著作現在基本上還很少，倒是在人們不帶看黨的黨史刊物中能見到一些（不少書的材料就是從這兒抄的）。但這類史料較翔實的研究選題和觀點又太受〈決議〉的限制，令人遺憾。

二 海外中國人的文革著述

近十餘年來，在海外的中國人用各種文字發表的關於文革的書籍已不下幾十種，除少數例外（如劉國凱的《文革簡史》），這些書大部分是講自己或自己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這些書的作者背景人多是所謂「成分不好」或「出身不好」的人，以資本家和高級知識份子背景佔最大比重，只有個別例外（如高原的《白來紅》和張戎的《鴻》）。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這類書的內容一般是集中談兩個時段的遭遇。一個是文革的頭三、四個月，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時期；另一個是1968年下半年以後的「清理階級隊伍」時期。了解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各時期遭遇迫害的對象很不一樣。在這兩個時期，的確是「階級異己份子」、「牛鬼蛇神」遭了殃；但在別的時期，卻是所謂「走資派」，甚至一般「保守派」群聚挨整。更重要的是，在一個時期遭迫害的人，會在另一個時期瘋狂地迫害別人。這就使人不由想問，上面講的這類書留下時間的「盲點」意味着甚麼？大概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別的時期（如1966年秋以後至1968年夏以前）鬥爭矛頭轉移了，作者或作者的家人有了一段喘息的間歇，這一段沒甚麼值得記述；第二種可能性是，作者或作者的家人趁鬥爭矛頭轉移，參與報復曾迫害過自己的人。至少有一本書透露，在1967年某個時候，作者及其兄弟曾教訓過使自己父母吃過苦頭的前政工幹部。我認識的

一位資深教授，十幾年後談到當時本系黨總支書記被造反學生北鬥派打時，仍十分幸災樂禍，稱他是「罪有應得」，他自己的兒子也是大學裏激進造反派的頭目之一。都說人們愛講自己「過五關斬六將」，不愛講「走麥城」，但在有關文革中個人經歷敘述中，最忌講的恰恰是自己「過五關斬六將」那一段。

海外文革文獻選題之狹隘說明，中國官方的硬性限制並不是妨礙文革研究走向深入的唯一原因。如果思路上不拓寬，即使某一天官方的限制軟化或撤消了，文革研究恐怕還是只會在幾個老題目上打轉，最多不過是把「花邊」描得更好看一些。

三 如何深入文革研究

文革研究如何才能深入下去呢？下面談談個人的看法，野人獻曝，只希望別貽笑大方。

第一 研究問題切忌先有框框

官方就要徹底否定文革自有其苦衷，這就是要防止文革中的派性死灰復燃；影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事業。對學者來說，則不必接受這個框框。二百年前，有人說法國革命「好得很」，有人說「糟得很」，今日仍有「好得很」和「糟得很」兩大派。而近十幾年來，國內、海外討論起中國的文革，幾乎眾口一詞都說「糟得很」。現在公開說「好得很」的，只剩下批西方的「毛派」。中國人中不贊成全面否定文革的實際上並不少；在國內、在海外都有，但他們由於種種原因無法或不願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恐怕只有當輿論對文革的評價超越了「浩劫」、「災難」這類簡單的定性標籤後，另一種聲音才可能被聽到。而對研究像文革這樣的歷史大事件而言，允許另一種立場存在，就等於開放了一批新的觀察點，可以使人們對它的認識更全面。

第二 要努力進行理論性思考

現在對文革的理解基本上仍停留在毛澤東所講的「感性認識」的階段，還沒有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階段。在法國革命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佔據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國有關文革的研究中，還很少有人真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來剖析這個歷史事件。無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解釋，大概都可稱之為「陰謀論」；有幾個壞人為了爭奪權力而蒙騙了億萬人民群眾。官方與非官方解釋的差別只在於前者強調林彪、四人幫的責任，後者則一口咬定毛澤東是罪魁禍首。陰謀論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方法。

當然，馬克思主義未必是能解釋文革的理論工具。重要的不是具體用甚麼主義來解釋，而是研究者應迫使自己進行理論性思考，我們研究文革是要通過了解這個史無前例的大事件來加深對社會一般規律的認識。歷史往往會在危機中，把人類社會的問題以集中的、放大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危機好像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實驗室」。疏於理論思考的人在「實驗室」轉一圈看到的只有瓶瓶罐罐，而懂得理論思考的人則會從「實驗室」裏拿出能造福後世的成果。

有關於文革的理論性思考可以採取兩種形式：一是用文革來檢驗現有的理論假設，二是從文革研究中發展出新的理論假設來。這正是我在自己的文革研究中試圖做的。在中文的《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中，我對韋伯(Max Weber)「超凡魅力型領袖」的理論提出了挑戰。韋伯認為，「超凡魅力型領袖」的追隨者是盲目的；而我發現，中國老百姓雖然認為毛澤東是「超凡魅力型領袖」，但他們的行為基本上是理性的。為解釋這種「矛盾」現象，我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假設①。在英文的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tihan* 中，我則着重用武漢文革中群眾的行為模式檢驗了理性選擇理論，證明加限制性條件後的理性選擇理論大致可以解釋群眾為甚麼參加文革，在甚麼條件下投身運動、在甚麼條件下捲入派性鬥爭、在甚麼條件下訴諸暴力、在甚麼條件下退出運動②。

第二 要探尋文革的社會根源

文革的根源問題往往被轉化為毛澤東為甚麼發動文革的問題。搞清毛澤東為甚麼在人生的最後十年發動這樣一場運動很重要。他的動機到底是甚麼？如果僅僅是為了搞掉劉少奇等人，以他在黨內的至尊地位，以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打垮劉少奇完全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沒必要發動億萬群眾參加。因此，流行的「權力鬥爭說」不足以解釋清楚毛澤東的動機。這方面還需當作大量的努力。

但是，即使我們搞清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也解釋不了文革中的大部分現象，因為文革的進程並不是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志進行的。1966年6月初在杭州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告訴與會者，文革作為一個運動將持續三個月左右，但以後迫於形勢，他一次次地修改文革的時間表，從三個月到半年，從半年到一年，從一年到三年，結果拖了整整十年。這件事本身說明，形勢比人強，那個這個人是「超凡魅力領袖」。劉少奇在1966年7月底的一次會議上說了一句很有啟發性的話：「這個運動有它自己的邏輯，不是你我所能左右的。」我們且不管他的意思是甚麼，只借用這句話說明毛澤東個人發動文革的動機，只是解釋這場運動的一個變量。要解釋億萬群眾在文革中的行為，就得尋找其他變量。

文革的社會根源是指，造成文革時期中派系分野的社會原因因是甚麼？對此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的回答。紅五類—黑五類，老工人—年青工人，固定工—臨時工，私廝份子—落後份子，幹部—群眾，朋友—非朋友，同姓—非同姓，都可能影響人們選擇參加哪一派的決定。這些關係在文革前的社會中以甚麼形式存在？各種關係相互怎麼影響？社會結構在多大程度上受社會的基本性質、生產關係、經濟發展階段、權力分配方式等因素影響？各地區間社會結構有甚麼差別？此類差別如何影響各地區文革的進程？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認真研究。總之，研究文革不能只研究1966至1976這十年，事實上文革

期間，如何評價「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究竟是派性鬥爭的一個焦點。

第四 要逐步消除上層政治鬥爭中的疑點

由於內部資料不公開，文革期間上層政治鬥爭中的疑點還很多，搞清這些疑點才能使我们真正了解文革中的一些關鍵轉折點。我一直對三件事不清楚，在這裏提出來，希望得到知情者的指點。

第一件是神秘的「北京工作組」。這個提法是我在文革初期周恩來等負責人的講話中發現的。由於不止一次講話提到它，因此可以排除記錄錯誤的可能性。1965年11月10日，也就是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當天，楊尚昆被免去了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一個月後，總參謀長羅瑞卿被解職。楊尚昆負責中南海的警衛，羅瑞卿則負責毛澤東去外地時的安全。兩個貼身的人突然成了可疑份子，不由毛不警惕。他在1965年底與許世友、譚震龍等人談話時，就曾問過他們「北京發生反革命政變怎麼辦？」由於毛澤東認為北京不安全，他從1965年底離開後，有半年多沒回北京。「北京工作組」大約在此稍後成立。據說是經林彪提議成立的。工作組先花了兩個多月解決中南海內部安全問題。1966年5月，中央開擴大會時，為了預防萬一，它還向北京調集了部隊。同時開始把北京的五類份子外遷。6月10日周恩來就此事請示毛，毛指示就地消化。6月13日周回京傳達，中止了強制五類份子離京的計劃（不過後來紅衛兵興起後，又自發組織了驅逐五類份子行動）。「北京工作組」大概到1966年8月以後才撤銷。由於它的工作，毛澤東對北京的安全放了心，於7月18日從武漢回到了離別半年多的首都。

如果這個「北京工作組」真存在過，楊成武很可能是它的領導人。楊成武於1966年3月取代了羅瑞卿的總參謀長職位。後來，周恩來等領導人多次提到楊成武防政變有「特殊貢獻」。「北京工作組」的

存在為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講話」留下了註腳，後來批判林彪時，指責林彪在該講話中大談「政變經」是想為自己政變埋下伏筆，這個指責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當時最擔心政變的是毛澤東，林彪在講話中提到「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非常多措施」，這些措施中應該就包括成立「北京工作組」。再說林彪當時的位置那麼牢靠，何必要多此一舉搞甚麼政變呢？

奇怪的是，過去十幾年出版的各種「秘史」中竟沒有一處提到這個「北京工作組」，使人不得不懷疑它是包含了太多的秘密，以致有人要牢牢守住它們不使洩漏。確定「北京工作組」是否存在，對理解毛澤東為甚麼發動文革有顯然易見的重大意義。

第二件事是發生在1968年3月的「楊余傅事件」。在這個事件中余立金倒臺是由於跟林彪的寵將吳法憲鬧彗扭，傅崇碧倒臺是因為得罪了江青。那麼楊成武為甚麼倒臺呢？當時只批他寫了一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文章，指責他「名為樹別人，實即樹自己」。這又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楊成武在倒羅瑞卿中是立了大功的，「防政變」又有「特殊貢獻」，所以他在1966-1967兩年一度春風得意，享有陪伴毛澤東巡視各地的殊榮。他突然倒臺的真正原因是甚麼？在楊成武在北京一夜變成階下囚的同時，上海出現了以軍隊院校學生為主的「炮打張春橋」運動。這件事據說是林彪身邊之人授意的，直到江青與葉群談判後，張春橋才免於垮台。張春橋是另一位當時常有陪伴毛澤東巡視各地殊榮的人。他和楊成武一文一武鞍前馬後為毛澤東奔走，許多「最高指示」經由他倆發往全國。為甚麼這時雙雙倒臺？誰是整他們的主謀？原因何在？楊、張二人結局為甚麼不一樣？

第三件事是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角色。從已發表的材料，我們知道林彪一直身體不好，而他老婆葉群又極愛攬事。因此，他與外界的信息傳遞完全由葉群控制。從林彪在文革中發表的言論可以看出，他對形勢的理解往往慢半拍。兩報一刊已過時的提法有時會出

現在林彪講話稿中。而他講話又多講空話，少有實際內容，與其他文革運動前沿指揮員們的講話形成鮮明對比。這說明他對林家大院以外發生的事不甚了了。因此，我們有理由猜測他未必知道葉群和林立果幹的……事。如果有個「五七一」政變計劃的話，他也可能被蒙在鼓中。我們從有關林彪罪行的文件中，很難找到他知道「五七一」計劃的真憑實據。最重要的是，揭發林家叛逃的林豆豆在林彪上飛機前偷聽到他喃喃地說：「我至少是個民族主義者……。」這意味著林彪可能直到最後一分鐘才得知葉群和林立果惹了大麻煩，雖然他知道無法清洗自己，大禍已臨頭，但他可能並不情願外逃。

第五 要剖析各類「麻雀」、從微觀層面了解文革政治鬥爭的邏輯

文革不僅僅是中南海內的權力鬥爭。如果文革只是宮廷政治而已，它便沒有太大研究意義。文革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億萬中國群眾在一段時期內曾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它。當然，運動也有旁觀者，即所謂「逍遙派」。問題在於為甚麼有人積極投入，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為甚麼有人參加造反派，大部分人加入保守派？為甚麼有人始終熱情不減，有人則很快從政治中急流勇退？這些問題只有進行微觀層面的研究才能解答。在中國，微觀政治主要在單位內部展開。單位即是「麻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解剖「麻雀」對了解微觀政治的主要特點是必不可缺的。另外「麻雀」雖然看似一樣，但實際上有不同類別。單位亦如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單位與街道工廠很不一樣；經過「四清」整肅的單位與沒經過「四清」的單位不一樣；學生與成年人不一樣；黨政機關與其他各類單位不一樣。要對各種類型單位的政治鬥爭模式有所了解，就得解剖各種類型的「麻雀」。只有了解了不同的微觀政治鬥爭模式，才有可能在總體上對微觀政治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如果不解剖各類「麻雀」，就很難對「出格」的現象作出解釋。

第六 要進行各地文革史的個案研究

從中觀層面了解各種結構性變量對運動的影響。如果說單個研究者能夠在微觀層面對不同單位進行比較的話，要對各地文革進程之同異進行比較就非單個研究者所能及。各地的文革有各地的特點，例如，一、運動初期大部分省市派出過工作組，但山東沒派，天津好像也沒派。二、在全國大部分省市，文革中的工人組織與學生組織都很發達，且互相交織在一起；但上海的學生運動很快夭折，北京的工人運動先天不足。結果北京只見學生組織稱霸，上海學生組織卻難有建樹。三、1967年春夏之交，武漢七二〇事件前後，各地保守組織（如四川的「產業軍」、武漢「百萬雄師」等）紛紛在中央干預的壓力下分別離析，但也有例外，如廣東的保守派「東風派」並沒有垮台，廣西的保守派「聯指」還對騷擾一時的造反派「四二二」發起了血腥的反攻。四、中部和南部省份武鬥較為頻繁，時間持續比較長；而且大規模的武鬥一般發生在允許戶外活動的季節，如湖南、湖北、河南在1967年春夏之交的武鬥，廣西、四川、山西、陝西在1968年春夏之交的武鬥。五、大部分省份的派性鬥爭在1968年底以後就被壓抑住了，但有些省份在1969年、1973-1974年、1976年，派性鬥爭的狼煙再起，如湖北、浙江、河南、河北等省。

上面列舉的只是隨便想到的五個方面。各地文革在其他方面還有更多的不同點。如何解釋這些差異？可能的變量很多，如中央的直接控制干預程度、各地社會階層分布、地方領導人與中央領導人的個人關係、地方派別與駐軍的關係，甚至地理位置等都可能影響運動進程。理清這些變量需要有人細心地研究各地的文革史，其工程量和難度都是巨大的。

上層政治、微觀政治和中觀政治加起來才構成文革政治史的總體。目前，第一個層面的研究剛剛起步。第二、第三個層面的研究還如鳳毛麟角。文革政治史研究依然任重而道遠。

第七 要重視文革經濟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的研究

文革中軍事離不開政治，但生活的方方面面又遠非「政治」兩字所能概括。如果眼光超越政治史，我們會發現文革有無窮的、多采多姿的題材可供研究。西方人如何研究法國革命也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示，請看下面列舉的一些近期出版的書名：

- 《法國革命中的家庭羅曼關係》
- 《親姐妹：婦女記憶中的法國革命》
- 《法國革命中的士兵》
- 《法國革命時期的都市戰爭》
- 《法國革命文化史》
- 《法國革命——一個經濟解釋》
- 《音樂與法國革命》
- 《法國革命的文化根源》
- 《重理框架：法國革命的敘、源與地區》
- 《法國革命中的報刊》
- 《法國革命早期一份保守刊物的製作、分銷與讀者》
- 《法國革命時期的大眾戲劇》
- 《法國革命中的外省政治》
- 《巴黎失蹤的兒童：法國革命前的謠言與政治》
- 《軀體與法國革命：性、階級與政治文化》
- 《1789：法國革命與教會》
- 《法國革命中的農民》
- 《婦女與法國革命時期的公域》
- 《法國革命中的雅各賓俱樂部：中期分析》
- 《節日與法國革命》

只要把書名中的「法國革命」換為「中國文革」，這些不都可以作為文革研究的題材嗎？其實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有意思的題材，如法國革命中有對財產的沒收，中國文革中也有抄家沒收，兩者之間有甚

麼同異？如法國革命中「小冊子」起了很大作用，中國文革中形形色色的小報也有重大作用，清華《井岡山》的發行量一度超過不少官辦大報。小報的編輯、製作、發行、內容、讀者、分類大可研究。如文革期間，兩報一刊加新華社的記者在各地不僅充當中央的耳目，有時甚至扮演「欽差大臣」的角色，直接插手地方運動；他們為甚麼有如此大的權勢？如自殺現象，甚麼人自殺？在甚麼情況下自殺？自殺者年齡與背景分布。如武鬥現象，甚麼人參加武鬥？甚麼人不參加武鬥？參加者的動機是甚麼？武鬥犧牲者的年齡、背景及死因有甚麼特點？如文革中空空見慣的各類通告、勒令、通緝令。如文革時期中小學教材的編排及內容。如文革中崛起的新詞、新俚語。如文革時期各種宗教宣傳畫和漫畫。如文革中出現的新詞、新俚語。如文革時期各種宗教信徒的表現與反應。如文革時期流行的兒童遊戲。如離婚現象。如司法程序的變更及影響。如一再挨批、一再興起的「經濟主義」。如泛政治浪潮中出現的「地下工廠」、「投機倒把」。如派系鬥爭中出現的詩歌（白樺在1967年夏就寫一批這樣的詩）。如京胡、板胡、二胡等樂器普及的原因和影響。如……。

現在關於文革的描述給人一個印象，當時人人革命、時時革命、處處革命；生活毫無姿采，這至少與我個人的經驗不吻合，下面舉四個方面的例子。

甚麼人與甚麼人談戀愛結婚？傳統社會中，戀愛結婚一般以門當戶對為主。現在有關文革的報導，常講一些有教養的高級知識份子的女兒嫁給農村青年，或資本家的兒子找不到老婆的故事。誰也不能否認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文革時期，但它們有多大代表性就很難說了。如果進行統計分析，其結果可能證明文革時期的戀愛婚姻仍以門當戶對為主，且與別的時期沒甚麼差別，甚至有可能比別的時期還強些。這不僅是因為成分好的青年不願與成分不好的青年結成連理，也因為家庭背景有問題的青年並不一定願找成分好，但家境差、「教養」差的人當對象。如幹部子弟即使在父母受衝擊時，也自覺高人一

等。相當多的黑五類子女也有這個感覺。我有位朋友是資本家子弟，他當時年近三十仍沒有對象，這並不是因為他找不到女友；而是因為即使在家庭倒臺的情況下，他的擇友標準仍很高。他在私下對我明白講，他為甚麼瞧不起工人子弟。在成分好的人中，只有那部分家裏有「教養」的幹部子女，他才看得上眼。工農出身的革命幹部子女，他也瞧不上。

革命之外還有休閒嗎？文革期間，尤其是文革高潮期，大多數人的休閒時間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原因很簡單，學校停了課，工廠半停產。休閒時間幹甚麼呢？成人們下棋、打撲克、釣魚、做木匠活；大學生學外語、搞數學、擺弄電器；中小學生的玩意更多，如養鴿子、鬥雞、打群架、在街頭閒逛、唱「黃歌」、談論異性同學……。1967年夏天，當兩派為爭權奪利廝殺不已時；武漢老百姓卻正在紅茶館和打雞血的神效風靡，聚集在派鬥觸及不到的角落裏交流經驗。別的城市的市民一定也有他們的非革命的休閒方式。有人曾研究過法國革命時期市民的日常生活的革命行為，只講「早請打發時光知道多少呢？如果只講文革時期的革命行為，只講「早請示，晚匯報」，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後代們也許會問：為甚麼他們的先輩會著魔變成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神仙。如果他們得到這個印象，就是文革研究者的失職。

人們穿著整齊劃一嗎？「穿『毛裝』的中國人騎在自行車上，男女老少一個樣」，這是70年代訪華洋人對中國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但這個印象只是相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才是對的。住在中國的老百姓，尤其是都市的青年男女，一眼就可以看出人群中的差別來。差別在於穿甚麼樣的衣服，甚麼質地的衣服；穿甚麼鞋、哪兒產的鞋；騎甚麼牌的自行車，甚麼型號的自行車。軍裝一度十分時髦，但軍裝有各式各樣的，時髦程度也不一樣。假軍裝沒有真軍裝時髦；兩個兜的軍裝沒有四個兜的軍裝時髦；新軍裝沒有舊軍裝時髦，舊軍裝中將校呢的最時髦。鞋也有講究。如上海產的「回力」牌白色深腰球鞋，北京產的

燈芯絨面黑邊白底懶漢鞋一度在武漢青年中很時髦（外地大概也一樣，見蘇童的小說〈回力球鞋〉）。同是「回力」鞋，藍色或綠色就要差一檔次；同是北京懶漢鞋，黑邊黑底就不夠味道。至於外地仿造的「回力」鞋或懶漢鞋，不管仿造得多像，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真假來。自行車則以「永久牌」十三型最高貴。「永久十三型」用的是錳鋼車架，結實不說，還有體輕的優點。它的單支架又不同於別別別別別別別。雖然，它的價格在當時是最高的，但在市場上很難買到，看自行車票也買不到。姑娘們的講究更多，頭髮怎麼梳，用甚麼顏色的頭飾，領口怎麼翻，衣服如何配……名堂多了。總之，文革那幾年，頭，仍有時髦要講；在講時髦的人眼中，世界仍是多姿（儘管不太多采）的，豈是「整齊劃一」四個字所能概括的。

人們讀甚麼書看甚麼電影？有一次關於文革的學術討論會上，一位美國教授提交的論文專門談中國青年人在文革期間讀甚麼書。但我發現，他所講的不過是文革年代，中國出了哪些書，這些書的主要內容是甚麼。把文革中出版的書當作人們在文革中讀的書是荒謬的。文革期間，人們當然會讀當時出版的書，但他們讀的不僅僅是那些年出的書。以我個人經驗為例，文革那幾年是我讀書最難的時期。中外文學經典名著全是那些年讀的。甚麼莫泊桑、巴爾扎克、大仲馬、小仲馬、契科夫、雨果、傑克倫敦、馬克·吐溫、曹雪芹、馮夢龍、羅貫中、郭沫若、郁達夫、茅盾……全是那些年讀的。說來慚愧，文革以後反倒沒再怎麼讀它們。當時我對詩歌有興趣，古的讀李白、杜甫、辛棄疾、李清照；洋的讀馬雅科夫斯基、雪萊、普希金；當代的讀聞一多、徐志摩、臧克家、艾蕪、戴望舒、聞捷、郭小川等。這些書都不是文革中出版的，但只要有心找，總能找得到。而且為我書選找出了朋友，找出了秘密小圈子，一個人又與另一個人建立關係，形成一張巨大的地下圖書交換網、讀書會網、詩社網。這些網絡不僅我所在的武漢有，全國各地都有^⑤。即使文革中出的書，也不一定是「革命」的。例如，70年代初，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上海組

織人馬翻譯了一批外國小說，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甚麼》、《白輪船》等。上海選分門別類出版了一套文學、哲學、生物方面的《摘譯》雜誌供內部發行。這些書是當年的搶手貨，因為它們是打開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人希望先讀為快，書在朋友之間周轉效率極高，有的書甚至異地流動。說出來也許有人不信，我從沒讀完過文革中發行量最大的小說《鸚鵡天》和《金光大道》。其實我是喜歡浩然作品的，只因為這兩本書隨處可見，總想先讀別的書，沒書讀了再讀它們。沒想到搞得到手的書從沒斷過線，竟然錯過了讀浩然的代表作。我的經歷一點也不特殊，身邊喜歡讀書的朋友都跟我一樣。文革後結識的朋友們談到那十年讀書的情況，相去也不太遠。那些抱怨文革中沒書讀的人大概不曾下功夫找，一點不大的功夫而已。

文革後流行一句話，說是文革中「八億中國人只能看八個樣板戲」。這是誇張的話，不能太認真。做舉一例，文革期間，「毒草影片」人們沒少看。放的人說是為了批判，看的人也說是為了批判，但大部分人看的目的解悶。如有人以為他們是為了「批判」毒草影片而大動干戈，會護知情者笑掉大牙。我那時年齡小，沒甚麼「批判能力」，但也隨大人看了《林家鋪子》、《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清宮秘史》、《武訓傳》、《劉少奇訪問印尼》、《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等幾十部片子。70年代初，為「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曾放映過《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啊！海軍》等進口片，在市民中造成一陣波瀾。說文革中文化生活單調不假，但說那十年只有幾個樣板戲可看則顯得記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問題是這些說法如此流傳下去，以訛傳訛，外國人和後世人還真以為這是實情。上面四個例子說明有必要研究文革期間的婚姻、休閒、服飾和文化娛樂。這些屬於日常生活史的領域很容易被忽略，但它們實際提供了全新的觀察角度研究文革。

最近從《二十一世紀》雜誌得知，北京有人正在着手研究文化大革命藝術史^⑥。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希望文革經濟史、社會史、文學史、法制史、軍事史、外交史也受到人們的重視。

第八 要研究文革對中國以外世界的影響

文革對世界曾產生過極大的影響。60年代中期是世界性的反叛時期。雖然，中國那時十分封閉，但關於文革的消息不斷出現在歐美各大報刊上。西方左派們對毛澤東的社會實驗讚不絕口，有的左翼大學生還組織了自己的「紅衛兵」。從當年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佔領校園的圖片上，我們可以強烈感覺到中國文革的影響。這裏重要的不是那批洋人對文革的理解對不對（別國人對法國革命的理理解也不一定對），重要的是實際上的影響有多大。關於法國革命的國際影響，著作浩如煙海，最近仍有諸如《法國革命對歐洲意識的影響》、《法國革命與英格蘭啟蒙運動：1789-1832》等力作問世。中國文革對世界的影響似乎還是一個不曾有人系統研究過的領域。以上拉拉雜雜談了一點我對如何展開文革研究的看法。再過一年，文革就有30個年頭了。30年說長也長，說短也短。一見30年已經過去了。這30年裏，中國的文革研究還談不上有多大進展。再過30年，絕大多數文革親歷者將會離開這個世界，使文革研究失去最重要的資源。但願文革研究能在文革30周年之際「立」起來，並一步步走向繁榮。

註釋

- ①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 ② 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③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
- ④ 《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4年4月號，頁160。另參王明賢〈紅衛兵美術運動〉：《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8月號，頁76-88。